

濮茅左 著

楚竹書《周易》研究

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

濮茅左 著

楚竹書《周易》研究

上

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楚竹書《周易》研究——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 / 濮茅左著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6.11

ISBN 7-5325-4188-6

I. 楚... II. 濮... III. 周易—研究 IV. B221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5) 第 074853 號

責任編輯: 童力軍 秦志華

楚竹書《周易》研究

——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
(全二冊)

濮茅左 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二廠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194 1/16 印張 67.25 插頁 42 字數 1,184,000

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500

ISBN 7-5325-4188-6

B · 512 定價: 360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 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上編

楚竹書《周易》研究

楚竹書《周易》導言

——兼及近年來楚竹書研究

楚竹書《周易》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一部最早《周易》。它的出現為我們了解、研究先秦時期的易學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資料，在中國易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。儘管有一部分竹簡失散，但是，我們從中還是可以看到先秦時期《周易》文本的基本面貌。特別是楚竹書《周易》中出現一組失佚了二千餘年的易學符號，這些符號至少在《帛書《周易》》中已不見存在，這是易學的新發現，它的形式、內涵有著特殊的意義，這為我們認識、研究先秦易學又提供了一個新的課題。

楚竹書《周易》的發現，使我們對卦、爻辭能有更深入的理解。今天我們不但能够看到甲骨文、金文、陶文中的易學考古資料，而且還看到了更多的出土文獻，如帛書《周易》、阜陽漢簡《周易》，以及與《周易》相關的馬王堆漢墓帛書《二三子》、《繫辭》、《易之義》、《要》、《繆和》、《昭力》，王家臺出土的秦簡等。通過楚竹書《周易》與其他出土文獻、傳世文獻的比較研究，可以看到不同歷史時期的用字情況，也能使我們在考釋中客觀地採納本字說或通借說，對卦爻辭能有更準確、更深刻的理解。

馬承源先生為搶救楚竹書《周易》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
從「魯壁魏墳」到「郭墓滬簡」，這是二千餘年間戰國竹書的四次大發現。「魯壁魏墳」的竹書文物我們已無法看到，留給我們的只是歷史記載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武帝末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欲以廣其宮。而得《古文尚書》及《禮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凡數十篇，皆古字也。」又《漢書·魯恭王傳》曰：「恭王好治宮室，壞孔子舊宅，以廣其宮，聞鐘磬琴瑟之聲，遂不敢壞，于其壁

間得古文經傳。」

《晉書·束皙傳》：「初，太康二年（二八二年），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，或言安釐王冢，得竹書數十車。其《紀年》十三篇。」又：「其《易經》二篇，與《周易》上下經同。《易繇陰陽卦》二篇，與《周易》略同，《繇辭》則異。《卦下易經》一篇，似《說卦》而異。《公孫段》二篇，公孫段與邵陟論《易》。《國語》三篇，言楚、晉事。《名》三篇，似《禮記》，又似《爾雅》、《論語》。《師春》一篇，書《左傳》諸卜筮，『師春』似是造書者姓名也。《瑣語》十一篇，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。《梁丘藏》一篇，先叙魏之世數，次言丘藏金玉事。《繳書》二篇，論弋射法。《生封》一篇，帝王所封。《大曆》二篇，鄒子談天類也。《穆天子傳》五篇，言周穆王游行四海，見帝臺、西王母。《圖詩》一篇，畫贊之屬也。又雜書十九篇：《周食田法》、《周書》、《論楚事》、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》。大凡七十五篇，七篇簡書折壞，不識名題。」

由于缺乏竹書物證，歷代學者雖然讀這些書，研究這些書，同時也在懷疑這些書，引發了今古文兩千年之爭，成為學界懸案。然而，誰也沒有料到兩千年後，中國考古界發生了重大奇跡，竹書再現。一九九三年、一九九四年、二〇〇〇年在我國出現了大量的戰國竹書，最具代表的就是郭店楚墓出土（一九九三年）和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搶救回歸的竹書（一九九四年、二〇〇〇年）。從此，我們有了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，原始的、第一手的戰國古籍，這是極為珍貴的文物，也是震撼世界的考古發現。特別是出現了帶有紅黑符號的楚竹書《周易》，以及《孔子詩論》、戰國的字書等重要文獻。中國歷史文化瑰寶的再現，充實、豐富了歷史文獻，冰釋了歷史上的一些懸案，學術界為之震驚。

一九九三年十月，湖北荊門市博物館對郭店一號楚墓進行了搶救性清理發掘。墓位於紀山楚墓群中，屬東周時期貴族墓地，南距楚國都城紀南城九公里。墓為一棺一槨，保存較好。《禮記·檀弓》「天子之棺四重」，鄭玄曰：「諸公三重，諸侯再重，大夫一重，士不重。」根據當時君、大夫、士等棺槨厚薄之制，可知墓主身份為士。墓中出土竹簡共八百多枚，其中有一部分無字簡，有字簡據整理後的數位統計，共存七三〇枚，大部分完整，計一萬三千字。經整理，發現先秦儒道兩家典籍與佚書共十八篇。具体如下：

《老子》甲、乙、丙是迄今為止最早傳鈔本，其竹簡形制的長短不同，甲、丙本內容有重複，或與今本有異。發現竹書三組。甲組共有竹簡三十九枚，竹簡兩端呈梯形，簡長三十二·三釐米，兩道編綫。乙組共存十八枚，竹簡兩端平齊，簡長三〇·六釐米，兩道編綫。丙組共存十四枚，竹簡兩端平齊，簡長二六·五釐米，兩道編綫。現存二千〇四十六字。

《太一生水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所謂「太一」就是先秦時期稱的「道」。論述「太一」與天、地、四時、陰陽等的關係，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著作。也以為在子思學派《禮運》、《易傳》等著作的基礎上，發展出了稷下思孟學派的宇宙生成理論。共存十四枚，竹簡兩端平齊，簡長二六·五釐米，兩道編綫。

《緇衣》內容與《禮記·緇衣》篇相近，屬不同傳本。共有竹簡四十七枚，竹簡兩端呈梯形，簡長三十二·五釐米。兩道編繩。

《魯穆公問于子思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內容為魯穆公問于子思何謂忠臣事。共有竹簡八枚，竹簡兩端呈梯形，簡長二十六·四釐米。兩道編綫。

《窮達以時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內容與《荀子·宥坐》、《孔子家語·在厄》、《韓詩外傳》卷七、《說苑·雜言》、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所載孔子困于陳蔡之間時答子路語相類。共有竹簡十五枚，竹簡兩端呈梯形，簡長二六·四釐米，兩道編綫。

《五行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內容與馬王堆漢墓帛書《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·五行》相類，文中「五行」指仁、義、禮、智、聖。共有竹簡五十枚，竹簡兩端呈梯形，簡長三十二·五釐米。兩道編綫。

《唐虞之道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內容頌揚堯舜的禪讓，及舜知命修身的品德，有關史實也見于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等。共存二十九枚，竹簡兩端平齊，簡長二十八·二左右釐米，兩道編綫。

《忠信之道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主論「忠、信」，提出：「忠，仁之實也。信，義之期也。」共存九枚，竹簡兩端平齊，簡長二十八·二至二十八·三釐米，兩道編綫。

《成之聞之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共存四十枚，竹簡兩端呈梯形，簡長三十二·五釐米，兩道編綫。

《尊德義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共存三十九枚，竹簡兩端呈梯形，簡長三十二·五釐米，兩道編綫。

《性自命出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共存六十七枚，竹簡兩端呈梯形，簡長三十二·五釐米，兩道編綫。

《六德》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共存四十九枚，竹簡兩端呈梯形，簡長三十二·五釐米，兩道編綫。

《語叢》（一、二、三、四）為戰國佚書，篇名為整理者所加，類似格言文，內容涉及人與仁、義、德、禮、樂的關係，共存一百一十二枚，竹簡兩端平齊，簡長十七·二至十七·四釐米，三道編綫。

郭店楚簡的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。

上海博物館楚竹書，一九九四年三月在香港文物市場被發現，并被搶救回歸。竹書保存在原出土的長方體泥方中，周邊都已散亂，中心部分仍結成塊狀，泥方外邊簡體顏色深黃，露風見光即速變成黑黃色。當時香港傳聞竹簡來自湖北省。竹簡啓封檢查，化學分析爲中性水，一定程度上還保持了墓中埋藏高含水量的情況。經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高精度測試，竹簡年代屬戰國後期。在將近三年時間內，完成了全部竹簡的脫水去色的科學研究和實際的操作工作，通過了有關專家的鑒定，獲得了文化部科技成果進步一等獎。這是全國出土鮑水竹簡大批量脫水保護的首例。在整理過程中，凡能綴合的殘簡，按綴合後的現狀排列，殘簡則根據文義、編綫、簡端等實際情況，給予復原定位。經整理，約一千二百餘簡，三萬五千餘字，約有竹書八十種以上，竹書的最小尺寸是二十二·八釐米，最長尺寸是五十七·二釐米，每簡寬度約在〇·六釐米，厚度爲〇·一至〇·一四釐米，編綫有二道，有三道，是戰國簡牘發現史上竹書最多、內容最豐富的一次。竹書內容涉及歷史、哲學、宗教、文學、音樂、語言文字、軍事等，多爲極珍貴的佚書，也有與今本有歧異的《詩經》、《禮記》等中國文化基本典籍。竹書與郭店楚簡的時代、出土時間、出土地域相類，其文字、內容（文獻類）也相近。且《緇衣》、《性情論》和郭店楚簡的《緇衣》、《性自命出》重，但傳本略有不同。竹書集衆多戰國書手墨迹，風格端雅秀美，行款疏密得宜，在中國書法史上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由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、著名的青銅器學和古文字專家馬承源先生擔任叢書主編，二〇〇一年起分冊（大八開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見于今本或《郭店楚墓竹簡》者，一般都附有竹書與他本的文字比較表，以便從中看到版本差異、文字使用的具體情況。每篇都有彩色竹書全景、逐簡文字放大圖版，以方便學者研究、鑒賞、認定字形，并有相應的注釋。內容複雜的竹書，另列有附錄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，共發現二十餘種時人書寫的篇題，它們是：

一、《恆先》。二、《內豐》。三、《訟城氏》。四、《慎子曰恭儉》。五、《競建內之》。六、《子羔》。七、《殷言》。八、《宮》。九、《命》。十、《公子》。十一、《競公虐》。十二、《曹沫之陳》。十三、《吳命》。十四、《中弓》。十五、《陰陽》。十六、《隰朋與鮑叔牙》。十七、《氏古聖人兼之》。十八、《思民毋台》。十九、《齊師子家》。二十、《靈王既》。二十一、《葉公子》。二十二、《叔百》。二十三、《臧王既成》等，其餘的還有待進一步考證。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現已出版四冊，在此作一大致的介紹：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》概況：

《孔子詩論》（馬承源注釋）：戰國佚書。共二十九簡，約一千零六字，長五十五·五釐米，簡上下端弧形。較完整的簡右側有淺斜的編綫契口，每簡共三處，契口偶爾附有編綫殘痕。文字勻稱秀美，在契口處間距稍寬。各簡字數略有差異，滿簡約為五十三或五十四字。《孔子詩論》是我國文學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經典，已佚二千數百年，它的再現為我們認識《詩》的編次、《詩》的本義提供了最直接、最真實的史料，為我們了解孔子思想、孔子對《詩》意的評價、孔子授《詩》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證據。整理者指出：本篇與《子羔》篇及《魯邦大旱》篇的字形、簡長度、兩端形狀，都是一致的，屬同卷異篇。《孔子詩論》是弟子就孔子授詩內容的追記，簡文內容分為四類：第一類是簡的第一道編綫之上和第三道編綫之下都留白，內容為表述賦詩、奏樂、著文必須具有的志、情和言，並論《訟》、《大夏》及《邦風》。第二類是論各篇《詩》的具體內容。第三類為單簡上篇名，純粹是《邦風》的。第四類是單支簡文屬於《邦風》、《大夏》、《邦風》、《少夏》等並存的。指出《詩》各篇的排列是前所未見的重要資料，《詩論》二十九支簡就可能存在著不同于《毛詩》的《國風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頌》的編列次序。篇後附有《竹書本與今本詩篇名對照表》。

《緇衣》（陳佩芬注釋）：戰國傳本。共二十四簡，九百七十八字，其中重文十字，合文八字，長五十四·三釐米，三道編綫，竹簡兩端均經修正，呈梯形狀。篇題自加。整理者指出：今本與簡文的内容出入較大，不僅章數不同，章序先後排列與簡文完全不同。今本《緇衣》有的語句混亂，字數多寡與上博簡有較大出入。上博簡簡文結構較為嚴謹，全篇二十三章均以「子曰」起首，進一步敘述稱「則」或「故」，下引《詩》，再引《書》。本篇與郭店簡皆二十三章，郭店簡文還注明「二十又三」章，與竹書實際數正相合。指出今本《緇衣》第一、第十六、第十八等三章内容，簡文所無，為漢人杜撰或按別本移入的，除「子曰」外，不引《詩》和《書》，與《緇衣》其餘各章體例不合，漢儒已作過較多的修改和補充，已經不是戰國時代《緇衣》的原貌。今本可與《郭店楚墓竹簡》互相發明。篇末附有《上博簡《緇衣》與郭店簡字形對照表》。

《性情論》（濮茅左注釋）：戰國佚書。共四十簡，本篇總一千二百五十六字，其中重文十三，合文二。竹書長約五十七釐米，這是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收購回來的最長竹書。整理者指出：《性情論》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，該文從宏觀的角度起論，提出了天降命，命出性，性生情，情始道的相承關係，主論「性」、「情」兼及「道」的概念與特性，提出了彼此間的派生關係說。全文觀點鮮明，結構嚴謹。文中所說的「性」是指「人之本性」，人的自然共性，樸素地指出「性可

習」，性與習的關係，闡明了人性的可變性，人性的變化在於「用心各異，教使然也」，由於出發點的不同，指導思想不同，接受的教育不同，而導致人性的變化不同。辯證地提出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恆則固、「待習而後奠」。本文闡述了七種使人性變化的方法，為人的道德修養、禮教、樂教等方面提出了有關理論及概念。提出了人情七愛、五知、三惡等準則，人的道德行為是可以「用四術」即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引導。比、觀、體、理這四個過程也是古人了解事物、認識事物、接受事物、對待事物的過程。本篇認為人的意識、情感與樂聲密切有關，禮樂之說貫乎人情，兩者相互影響，互為變化。提出樂聲感人，心變聲變的聲心樂本、樂化說，較為深刻地闡述了樂的本質和內在規律，樂的產生、發展和社會關係，以及樂的鮮明的道德內涵，是我國先秦史上可靠的音樂理論資料。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概況：

《民之父母》（濮茅左注釋）：戰國傳本。共十四簡，本篇總三百九十七字，其中重文四、合文六。竹書整簡長四十五·八釐米，三道編綫。篇題根據本篇內容命名。內容見於今本《禮記·孔子閒居第二十九》及《孔子家語·論禮第二十七》。整理者指出：全篇內容基本完整，這十四枚簡是完全可以連續編聯的，且所殘文字可以通過今本得以補充。竹書記載了子夏向孔子請教的五個問題：內容中心環扣「民之父母」。竹書與今本有如下幾方面不同：一、竹書內容與今本簡繁不同；二、「五起」次序竹書與《禮記·孔子閒居》不同；三、竹書與《孔子家語·論禮》所記載的「五起」內容不同；四、用字、用詞不一。竹書《民之父母》的發現，對我們認識歷史傳本及其流變情況，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實例。《禮記》編集卷數歷代紛爭的原因，與後人歸并整理、合卷有著密切的關聯。今本所佚失的孔子語錄，對我們正確理解文意，全面地了解孔子思想、儒家的道德觀、人生觀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。竹書用字、用詞與今本的不同，為我們今後考釋楚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依據。文字書寫端正，運筆頗具特色，橫多露峰，豎、撇、曲筆則頓筆後而應勢提運，與傳統篆體均勻運筆法不同。

《子羔》（馬承源注釋）：戰國佚書。共十四簡，三百九十五字，其中合文六、重文一。竹簡兩端修作精細，呈弧形，竹簡總長約五十五釐米，三道編綫。第五簡的背文題有篇題「子羔」。整理者指出：簡文記述孔子答子羔所問堯、俊和禹、契、后稷之事，內容分兩段。關於堯舜的盛德和他們禪讓的神話，戰國時代諸子之言中所舉不同事例和各種評述很多，但比較分散。《大戴禮記·五帝德》載宰我問孔子有關黃帝、顓頊、堯、舜和禹的事，為司馬遷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

所採用而稍有修刪。而本篇載孔子所述堯、俊和三王排列成五位遠古帝王系統，為傳世東周儒家著述中所未見。

《魯邦大旱》（馬承源注釋）：戰國佚書。共六簡，二百零八字。竹簡兩端呈弧形，總長約五十五釐米，三道編綫。整理者指出：本篇記載了魯哀公十五年遭受了一次大旱，哀公以此就教孔子禦大旱之策，孔子明確提出需要加強刑德之治，而不必用瘞埋圭璧幣帛的慣例向山川神靈作求雨之祭。此後，孔子遇見子貢，彼此對禦旱之策做了分析和討論。這是孔子如何應對天災的一個很重要的見解。文章按時間先後為序記敘。

《從政（甲、乙）》（張光裕注釋）：戰國佚書。共分甲、乙兩篇，甲篇共十九簡（第六、七兩簡屬同簡，故實際為十八簡），乙篇六簡。甲、乙篇共六百五十九字，簡長約四十二·五釐米。整理者指出：甲篇、乙篇都以「從政」為主題，強調「從政」所應具備之道德及行為標準，故以此為篇名。因形制不同，文句可互作參考，故分別以《從政（甲）》、《從政（乙）》名篇。提出「五德」一辭，為先秦典籍未見，而所列德目「一曰悛（寬），二曰共（恭），三曰惠，四曰仁，五曰敬」（第五簡），與儒家所稱五德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（《論語·學而》），或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」（《論語·陽貨》）互有同異，儒家視為至高德目標準之「仁」德，僅被列為「五德」之一，為首見。本篇對「五德」之重要性加以闡釋，「不悛（寬）則亡（無）以頌（容）百姓；不共（恭）則亡（無）以敘（除）辱；不惠則亡（無）以聚民；不惠（仁）則亡（無）以行正（政）；不敬則事亡（無）城（成）」語為從政者深省，對研究先秦儒家諸德目之學說尤為重要。有些語句可與上博竹書《緇衣》及郭店楚簡《緇衣》彼此印証。《從政（乙）》篇之內容除談及政教法治外，亦講「恭遜」與「忠敬」之道，與儒家論仁學說關係密切。甲、乙兩篇內容可取與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等儒家典籍及睡虎地出土秦簡《為吏之道》比觀，為先秦政治思想研究增添可貴的新資料。

《昔者君老》（陳佩芬注釋）：戰國佚書。原無篇題，以首句「昔者君老」命名。共四支簡，一百五十八字，其中重文八，合文一。簡上下皆為平頭，完簡長四十四·二釐米，三道編綫。整理者指出：第一簡和第四簡有起首語和結語，第二簡和第三簡皆無可承接，四簡簡文均不能連讀，只能按記載事態進展的前後關係排列，其間缺失多寡無法判定。內容記述國君自衰老至亡故，太子朝見過程中的禮儀規範。禮儀過程大致如下：國君之母弟為太子入宮的佑導者，太子從早朝候至日昃，經多次叩問而進入宮門，母弟將太子送入宮後就退避，太子返回并再三要求與母弟同去見君，于是太子和母弟同時進宮聽君之命。後段云「各共爾事，發命不夜」。國君卒，太子則不聞不命，唯哀悲是思。本篇是研究先

秦朝見之禮及居喪之禮的可靠文獻。

《容城氏》（李零注釋）：戰國佚書。共五十三簡，二千零六十五字，其中合文二，重文三，簡長四十四·五釐米。整理者指出：此篇是講上古帝王的傳說，原有篇題《訟成氏》。容城氏見於《莊子》，為上古帝王中的第一人。全篇內容分七部分：第一部分是講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（估計約二十一人）；第二部分是講帝堯以前的一位古帝王，簡文亦殘缺，失其名，估計是帝嚳高辛氏；第三部分是講帝堯；第四部分是講帝舜；第五部分是講夏禹；第六部分是講商湯；第七部分是講周文王和周武王。簡文所述，三代以上，皆授賢不授子，天下艾安；三代以下，啓攻益，湯伐桀，文、武圖商，則禪讓之道廢而革命之說起。簡文兼及禹分九州，文王平九邦，而九邦之名向所未聞，為補古史之缺的寶貴材料。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三）》概況：

《周易》（濮茅左注釋）：本篇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《周易》。共五十八簡，涉及三十四個卦內容，一千八百零六字，其中合文三、重文八，又二十五個卦畫。完整竹簡兩端平齊，長四十四釐米，三道編綫。整理者指出：楚竹書《周易》的出現為我們了解、研究先秦時期的易學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資料，在中國易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。儘管有一部分竹簡失散，但是，我們從中還是可以看到先秦時期《周易》文本的基本面貌。特別是楚竹書《周易》中出現一組失佚了二千餘年的易學符號，這些符號至少在《帛書《周易》》中已不見存在，這是易學的大事，它的形式、內涵有著特殊的意義，除了反映對立統一的含義之外，同時還存在著一種陰陽轉換，互為因果的易學理論，這為我們認識、研究先秦易學又提供了一個新的重要課題。楚竹書《周易》，在形式上有三種表述方法，分別為卦畫、文字與符號。一、卦畫表述：由二個分別獨立的經卦組合而成的別卦，以一表示陽爻，八表示陰爻，這一形式帛書《周易》、阜陽漢簡《周易》承之，與王家臺秦簡、今本卦畫不同。二、文字表述：由卦名、卦辭、爻位、爻辭等部分組成。其用字、用辭、用句與帛書、今本或有不同。三、符號表述：由「」，「□」單獨或組合而表示，並兼以紅、黑兩色。符號的形式有六種。每卦書寫的格式為：一、卦畫。二、卦名。三、首符。四、卦辭、爻辭。五、尾符。在尾符後，作留白處理，不再接續書寫下一卦內容，以明每個別卦的獨立性。楚竹書《周易》無《易傳》內容。楚竹書《周易》的發現，結束了有關歷史懸案。易學有「九六」之爭，或以為「九六」之稱，為漢人所加，先秦未見，但楚竹書《周易》的發現，真相已白，證明了「九六」之稱，在先秦確已存在。

通過楚竹書《周易》與其他出土文獻、傳世文獻的比較研究，可以看到不同歷史時期的用字情況，也能使我們在考釋中客觀地採納本字說，或通借說，對卦、爻辭能有更準確、更深的理解。篇末附有竹書、帛書、今本的文字比較表，及符號說明。

《仲弓》（李朝遠注釋）：戰國佚書。共二十八簡，又附簡一，整簡長四十七釐米左右，三道編綫。整理者指出：本篇第十六簡背有篇題「中弓」。「中弓」，即文獻中的「仲弓」，為孔子所推崇，將之比之喻為「犁牛之子」，並認為「雍也可使南面」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，被孔子定為有「德行」的弟子之一。曾問政于孔子，語見《論語》、《史記》及《孔子家語》。簡中所錄大多不見于今本文獻。全文採用問答的形式。簡文記載了孔子「刑政不緩，德教不倦」的刑德並施思想，倡導以德為本，安民治國，「導民興德」，「老老慈幼」的良好風尚，提出「舉賢才」、「舉爾所知」，知賢才，舉賢才，用賢才的用人策略；主張采用治己愛人，「惑過與罪」的刑政手段。

《恆先》（李零注釋）：為戰國道家佚書，原有篇題。共十三簡，四百九十七字，簡長約三十九釐米，三道編綫。整理者指出：這是一篇首尾完具的道家著作。全篇共十三簡，第三簡背面有篇題作《恆先》，此據以題篇。「恆先」是「道」的別名。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」「恆先」就是指先天地而生，獨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作為永恆創造力的「道」。作者認為，天下的矛盾概念皆有先後，如中為外先，小為大先，柔為剛先，圓為方先，晦為明先，短為長先，但溯源作為終極的「先」是「恆先」。

《彭祖》（李零注釋）：為戰國道家佚書，竹書現存八簡，整簡長五十三釐米，三道編綫，篇題根據內容補加。整理者指出：彭祖，以彭為氏，名錢鏗，也叫彭鏗。《國語·鄭語》和《世本》等書講「祝融八姓」，其中有彭姓。彭姓世居彭城（今江蘇徐州），以錢鏗為祖，故稱「彭祖」。彭祖老壽，為神仙家所樂道（參看《列仙傳》卷上、《神仙傳》卷一《彭祖傳》），舊有《彭祖經》，托商王遣采女問道彭祖，講地仙之道，是所謂「房中七經」之一。這是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彭祖書。文章運用了張家山漢簡《引書》、馬王堆醫書《十問》、王家臺秦簡《歸藏》等資料。全文為狗（耆）老和彭祖的對話。

除整理者所引用的資料外，有關事迹還見于《論語》、《大戴禮記》、《楚辭》、《莊子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史記》等。傳彭祖即顓頊帝玄孫陸終氏的第三子彭鏗，一說彭祖姓錢，名鏗，一說彭姓，名剪（錢為古文），字鏗，堯封之于彭城。《莊

子》記載彭祖有所謂吹噓呼吸、吐故納新、壽考之所好，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，或以爲仙不死。史載有《彭祖養性經》一卷，因其道可祖，而稱之彭祖。竹書所記載的彭祖，無今本那樣傳奇，他提出「天地與人，若經與緯，若表與裏」，深刻地闡明了人與自然的密切關係，又提出「五紀（即『天紀』，《洪範》所謂的歲、日、月、星辰、曆數）必周，唯貧必攸（修）」、「五紀不合，福何以錫」的道理，反映了彭祖其人注重自然規律、注重客觀實際、注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。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四）》概況：

《采風曲目》（馬承源注釋）：爲戰國佚書，篇題根據內容補加。本篇存六簡，完簡應在五十六·一釐米以上，記載的內容是五聲中宮、商、徵、羽各聲所屬歌曲的篇目，另有穆、和、訐等九個變化音名，但沒有發現角的聲名。整理者指出：這些歌曲的篇目除《碩人》見于《詩·衛風》外，其餘皆查不到有文獻記錄。聲名所附的前、尾綴詞，也不見有先秦史料可資稽核。竹書殘存三十九篇曲目，每一分類名後都有一曲或多曲的篇目。除個別外，絕大多數未見于古籍，如《子奴思我》、《喪之末》、《牧人》、《道之遠爾》、《之白也》、《北野》、《咎比》、《王音深谷》、《思之》、《良人亡不宜也》、《奚言不從》等，是楚國郢都流行詩曲的調名。郢都曾是楚國的音樂文化中心，楚國流行的音樂相當有名，古代詩人稱之爲「郢曲」，這大約是采風樂曲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。古音樂專家陳應時教授認爲這是中國音樂史上的重大發現。

《逸詩》（馬承源注釋）：爲戰國佚書，篇題根據詩章首句補加，本篇存二簡。整理者指出：《交交鳴鵲》內容是歌咏君子「若玉若英」的品性和「若虎若豹」的威儀，以及彼此交好，「偕華偕英」等比喻。《多薪》是歌咏兄弟兩人之間親密無比的關係。

《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脾》（陳佩芬注釋）：爲戰國佚書，篇題根據內容補加。本篇總存十簡，完簡爲四十三·七至四十四·二釐米不等，三道編綫。《昭王毀室》總一百九十六字，內容爲昭王將新宮建在國人之葬地，礙人祭事。昭王得知後，令毀室以成人祭祀父老事。《昭王與龔之脾》一百九十二字，內容爲昭王因珖寶之事，與龔之脾產生誤會而後諒解事。

《東大王泊旱》（濮茅左注釋）：原無題，現題取用全文首句命名。本篇共二十三簡，總五百九十三字。由于這部分竹簡搶救歸來時，保存在原出土的泥方中，後在上海博物館實驗室中剝離、脫水、保存，因此，竹簡現狀十分完好。竹簡兩端平齊，長二十四釐米，寬〇·六釐米，厚〇·一二釐米左右，兩道編綫。竹簡行款：竹簡首尾都不留白，滿簡書

寫，每簡書寫字數在二十四至二十七字間。書體舒展，工而不苟，字距相近，體現了抄工對王室檔案的重視。整理者指出，本篇記載了戰國初期，有關楚國東大王的兩件佚事：東大王病疥和楚國大旱。楚東（簡）王西元前四三一年至前四〇八年在位，執政二十四年，史書記載有關事迹頗略，《史記·楚世家》「簡王元年，北伐滅莒」，「二十四年，簡王卒」，寥寥十餘字，《中子化盤》銘：「中子化用保楚王，用正（征）枳（莒）」記載的也是同一事件，又「晉烈公三年，楚人伐我南鄙，至于上洛」（《水經·丹水注》引《紀年》），以及有關楚屈將事。本篇的發現，是對楚史的補充，同時可以了解楚國在面臨王病、邦家大旱等重患交迫的情況下，由於傳統、習俗的影響，東（簡）王及其同僚所表現出的無奈。簡文涉及到有關軍事、官制、醫學、氣象、宗教等方面內容。

《內豐》（李朝遠注釋）：原有篇題。本篇總存十簡，完簡應四十四·二釐米不等，三道編綫。上篇講述君子之立孝基本原則是愛是用，禮是貴。君子孝子事父母的態度是無私樂、無私憂，從中道。下篇講述君子孝子事父母的策略，反對採用消極的「不食」手段，主張發揮積極有效、得宜助化的才智。內容多與《大戴禮記·曾子立孝》等篇有關。

《相邦之道》（張光裕注釋）：為戰國佚書，篇題根據內容補加。本篇一百零七字，總存四簡，三道編綫。整理者指出：文雖多殘缺，但已充分表達時君愛國愛民，並具仁德之心，及儒家對王道觀念的重視。

《曹沫之陳》（李零注釋）：為戰國佚兵書，原有篇題，分為上下兩篇。本篇總六十五簡，完簡應四十七·五釐米，三道編綫。曹沫，即曹劌，上篇記載了曹沫勸說魯莊公「毀鍾型」、「修政善民」，提出「儉以得之，而驕大以失之」的辯證治國策略。下篇記曹沫回答魯莊公問兵事，同時提醒魯莊公要「刑罰有罪，賞爵有德，貴賤同待」，「卒有長，三軍有帥，邦有君」。本文是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重要文獻。

二〇〇〇年，上海博物館的戰國楚竹書引起了海內外的關注，香港商人主動送上新得到的一批竹書。其中有戰國楚字書，有相當分量，十分重要，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字書。目前這批簡也已經完成了技術保護處理，且已作了初步分類整理工作，內有數部書籍。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將收入前兩次入藏的楚簡共一千二百餘支，三萬五千餘字，不包括這一批。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熱烈討論，研究的重點涉及：一、文字的考釋。二、簡序的排列。三、詞、句的語意分析。四、竹書的體裁、作者、學派歸屬。五、竹書與今本的比較研究。六、竹簡本身的研究（竹簡

的科學處理方法、綴合等)。七、結合史料、補充史料的研究和觀點。這些看法為進一步研究出土文獻提供了必要條件和基礎。通過郭店簡和上博簡和今本文獻的對比,使我們對楚文字有了新的認識。通假字的使用,使我們對楚方言有了更多的了解。相信隨著學界共同討論,共同研究,一定會取得越來越多的共識。

當今,簡牘研究已經成為世界性的顯學,學術界關注的焦點。

全國各社科院、大學、文物研究所、博物館,以及國際簡帛研究中心等上百個單位加入了研究,有的大學開設了討論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為主的專題研討課程,指導博士研究生,盛況空前。參加討論、研究的有關單位有: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、北京大學、中國社會科學院、中國文物研究所、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、四川大學、吉林大學、安徽大學、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、南京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臺灣中研院史語所、臺灣大學等,以及各地方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博物館、古籍整理研究所百餘單位。又有日本、美國、英國、德國、加拿大、法國、意大利、波蘭、荷蘭、丹麥、瑞典、盧森堡、捷克、以色列、韓國、新加坡、菲律賓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度尼西亞、巴西等各大學、研究所等參與了討論。

現在以簡帛為研究中心的主要機構有: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、國際儒聯國際簡帛研究中心、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簡牘研究室、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簡牘研究室、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、臺灣中國文化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臺灣簡牘學會、日本早稻田大學簡帛研究會、梅花女子大學戰國楚簡研究會、島根大學戰國楚簡研究會。有關簡帛研究專刊、叢書有:《清華簡帛研究》、《簡牘研究譯叢》、《簡帛研究》、《簡牘學研究》、《國際簡帛研究通訊》、《簡帛研究彙刊》、《簡牘學報》(臺灣)、《國際簡牘學會會刊》(臺灣)。此外,《道家文化研究》、《中國哲學》還出版了簡帛專輯。《文物》、《江漢考古》、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、《學術學刊》、《中國哲學史》、《孔子研究》、《文藝研究》、《周易研究》、《齊魯學刊》等刊物開設了楚竹書研究專欄。出版了簡帛叢書《新出簡帛研究叢書》。創辦中的還有《簡帛語言文字研究》(年刊)等。世紀簡帛目錄也相繼出版,如:《百年來我國(包括港臺地區)簡帛中文著作要目》、《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》(附著作、論文目錄),此外還有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論文目錄》等,目錄編著之細,進一步促進了竹書的研究工作。

除此之外,不少大學和研究機構還舉辦了一些形式多樣的研討會、講讀班等。如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,舉辦了

多次「簡帛講讀班」活動；南京大學亦開始啓動「簡帛暨出土文獻研討班」，每月舉行一次研討會，根據進展安排研究專題報告會。這一切都顯示出簡帛學熱度的升高。與此相應，許多學術期刊也緊追學術前沿問題，相繼推出一系列價值很高的研究論文，為推動新出楚簡與儒學研究的進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。

出版的有關專輯有：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與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著了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》（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三月）、張光裕主編《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》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，二〇〇三年十月）、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與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集》（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七月）、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《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》（上海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三年十二月），收集了有關學術會議的論文。

上博竹簡的發現，是中國學術思想的一次大震蕩，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未來發展必將會產生巨大影響。陳燮君先生說：「戰國楚竹書的發現、保護、整理和研究，具有多學科、多領域的重大價值，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學術意義。戰國楚竹書的簡文字數之巨、跨越領域之廣、所涉書篇之多、提交版本之早，都已傳為美談。」（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一）·序》）馬承源先生認為：「竹簡的發現意義已不亞于重建一個博物館；饒宗頤先生認為大批楚簡的出土和研究，將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「自家的文藝復興運動，以代替上一世紀由西方衝擊而起的新文化運動」。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在諸多文化領域的研究將產生重大影響，其中包括文學、音韻學、古文字學、歷史學、民俗學、哲學、文學、美學、考古學、古文獻學、簡牘學，以及醫學、天文、地理、曆法、軍事、政治、宗教、法律等領域和現代物理、化學、電子、電腦等領域。利用可靠的新出土文獻，佐證歷史事迹，填補歷史空白，糾正歷史傳誤，使我們古老文明、悠久歷史更加光輝燦爛。對於先秦時期諸多文化領域將產生重大影響，為中華文明史補上了重要一章，也將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和世界，迎來一場新的東方文化的研究高潮。戰國竹書的大量發現也為我們研究楚竹書《周易》的內容、文字等提供了可靠的資料。

在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，《易》與歷史同步，為世人所重視，被尊崇為群經之首，「易道廣大無所不包，旁及天文、地理、樂律、兵法、韻學、算術，以逮方外之爐火，皆可援易以為說」，「易之為書，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總敘》），被譽之「易道深矣，人更三聖，世歷三古」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。雖《隋書·經籍志》記載「秦焚書，《周易》